

2101

(15)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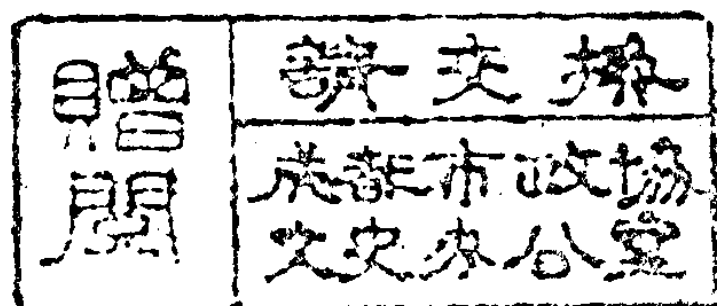
5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成都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 一、成都“十二桥血案”马力可 (1)
- 二、铁骨铮铮的杨伯恺烈士罗启维 (22)
- 三、怀念于渊烈士李实育 黄力扬 于民望 (44)
- 四、战斗一生的王干青烈士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57)
- 五、刘骏达烈士事略段吉泉 柴与言 (65)
- 六、忆世界语学者许寿真烈士欧阳俊明 (73)
- 七、并肩战斗的徐茂森、徐海东烈士王愈文 (83)
- 八、怀念我的弟弟张大成烈士张大昌 (88)
- 九、革命青年毛英才烈士
.....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整理 (92)
- 十、蒋帮溃逃前夕血腥屠杀十二桥烈士纪实
.....李文孚 (99)
- 十一、回忆“四·九”血案杨 俊 (106)
- 十二、在党领导下的《民声报》彭玉鸣 (125)
- 十三、党在抗日战争初期领导的《星芒报》
.....杨 槐 (130)
- 十四、《时事新刊》的诞生和被查封的经过
.....唐会昌 (138)
- 十五、回忆我在成都解放前夕地下斗争的一些情况
.....吕振修 (145)

成都“十二桥血案”

马 力 可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全国人民欣喜若狂，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但是，不久美蒋反动派就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发动内战、加强法西斯独裁的政策。他们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呼吁、抗议，肆无忌惮地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再次陷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西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的人民群众，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与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了反美反蒋的斗争，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美蒋反动派面对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和英勇斗争的革命人民，十分恐惧，只能乞灵于极端野蛮的镇压，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以巩固其反动统治。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四川疯狂制造白色恐怖，穷凶极恶地迫害革命人民，摧残民主革命运动，大肆逮捕地下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学生以及其他革命进步人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复灭前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发泄他们的仇恨，继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歌乐山灭绝人性地屠杀革命烈士之后，又在成都十二桥畔，将关在敌四川省特委

会监狱中的革命志士杀害。这就是成都“十二桥血案”。

狱中斗争敌胆寒

在成都将军衙门街的敌四川省特委会的监狱里，经常囚禁着四、五十位革命志士，他们忍受着生活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表现得十分坚贞、英勇、顽强，他们把暗无天日的牢狱变成了革命的大学校，变成了革命的大家庭，变成了与敌斗争的战场。他们在生活中斗争，在斗争中生活。

一、在生活中斗争

狱中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革命同志分别住在七间阴湿、霉臭和臭虫、蚊子成群的牢房里，特务为便于监视和防止意外，不准挂蚊帐，也不准点蚊香。每间牢房有一个或两个狭窄的铁栅窗以及专供送饭、送水用的一个小洞（只够一个人的头伸进伸出），牢门经常用大锁锁着。每顿吃的是夹生的、数量很少的有很多谷、稗、鼠屎、砂子、虫子、草节、霉米的“八宝饭”。有同志曾经数过，一碗饭里就有280多个谷子、稗子。喝水也是相当困难的。平时不能自由呼吸新鲜空气，更不能自由大小便。……生活上的各种折磨，一天天吞噬着革命同志的健康。许多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狱生活后，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肠胃病、失眠症。

生活上的痛苦折磨，使革命者意识到这是敌人想把他们拖垮、拖死。他们决心在生活中开展对敌斗争，想出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黎明时，他们不顾看守宪兵、狱卒的斥责、辱骂，轮流把头伸出门上的小洞口或紧贴铁窗，争取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放风”时，他们散步、做操、洗衣……抓紧时间活动身体。五号牢房的同志搞到几枚铜钱，

就用纸条做成毬子，比赛踢毬。晚饭后到睡觉前的一段时间，室内无灯光，无法看东西，一些特务头子又溜回家去了，狱中同志就利用这个时机唱戏唱歌、扭秧歌、讲故事或者下棋（用小石子、小砖块等作棋子）。五牢房的同志们在这个时间里常举行晚会，节目繁多，玩得很开心。在狱中，想讲卫生更是难上难，每天给水甚少，狱中同志就用这点水先洗脸，再洗身子，最后洗衣服。没有扫帚，抓把草还是要把地扫干净。为了把难于下咽的“八宝饭”吃下去，他们出高价找狱卒买些青菜和盐做点咸菜来送饭。没有罐罐，就用磁盅泡菜；没有刀，（入狱时，经过搜身，口袋里的水果刀、钥匙、火柴等都被没收一空），就用牙刷把磨起来切菜（解放后还在四号牢房里发现一把牙刷把刀）。五号牢房的余天觉同志被选为本室的总务主任，负责搞好本室的生活。有的同志家属费尽心力，通过各种关系，好不容易送进去一点零用钱、衣物、食品等，但都拿出来供同室的难友共同分享。他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四号牢房的墙壁上，用黑粉末画了一张简单的日历表，同志们一天一天地计算着日子，他们不是消极地等待着出狱，而是积极地斗争着！

狱中的生活是永远不会平静的，同志们也从不希望出现什么平静。每天他们都观察着狱中的动向，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了。敌人异常紧张：监狱院坝里架起了机关枪，看守宪兵增多了，巡逻的次数增加了，匪徒们如临“大敌”，可是狱中同志暗自好笑，谁会选在这个日子有所举动呢，敌人真是货真价实的蠢货。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晨，六号女牢房的马力可同志开始肚子阵痛，这是小产的预兆，经狱医诊断是血崩，但特

务、管狱员谢鲁却不给取药。中午以后，病情转重，终于小产了。在流血不止的情况下多次陷入昏迷状态，几次要求取保就医，但匪徒都置之不理。其它牢房的同志通过观察和秘密传递消息，终于了解了情况，有的向匪徒提出抗议，有的坚持取保就医，有的主张速请医生来狱治疗……。三号牢房的杨伯恺同志（中共党员，民盟中央委员、大学教授）和四号牢房的许寿真同志（中共党员、世界语学者、记者、国际世界语记者协会的中国代表）都喊管狱员谢鲁到自己的窗口，向他严厉地提出必须立即取保就医。六号牢房难友翁季嫦同志还向匪徒抛出血纸物证强烈抗议，经过这些抗议斗争，谢鲁才答应报请特务头子批准后，找刘云波医生看病。午后两三点钟了，谢鲁通知说：“准了”。刘云波与徐中齐是留德同学，于是刘云波医生被请到监狱看病。由于手术的需要，也由于匪徒们想保留线索，最后由刘云波医生担保，出狱三天，进医院治疗。狱中的同志，带着焦灼不安的眼光，目送担架，抬出虎穴。

女牢房年轻姑娘翁季嫦同志，在送去担架以后，成天的忧恐和紧张，使她瘦弱的身体难于支持，夜深了，她想着同住六十余天的难友入院后是否安全？久久难于入睡。这样几天后她病了，昏倒了。此事很快传到各牢房。许寿真等同志又在铁窗口叫住特务谢鲁，对他说：“翁季嫦昏倒了，一个人无人照应，还是应该取保就医”。几天以后，谢鲁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对着狱中同志大骂道：“你们闹得凶，不得了罗！翁季嫦一回家就上好，哪有什么病！今后不许这样大惊小怪”！不管特务怎么叫，这次斗争又获得了胜利。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挺进，敌人惶恐万分，加强了监狱里的戒备和看守，特务竟

将放风时间大为缩短，有时连大便都来不及解完，衣服也来不及洗。于是大家向特务提出严重抗议。经过多次斗争，同志们又胜利了，又能和过去一样，利用“放风”时间，进行多种活动和斗争。

二、革命的大学校

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妄图通过残酷镇压、逮捕囚禁，以窒息革命斗争。事实恰恰相反，压力越大，反抗越烈。勇敢、坚毅的革命者把监狱变成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

新难友入狱，杨老（杨伯恺）总是慰勉备至，他说：“我们因革命入了狱，这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我们没有过错，所以也就无过可悔。”他告诉难友，要泡咸菜，准备长期战斗。他还经常向同室难友讲革命理论，并根据狱中所能得到的材料，分析形势的发展，增强大家对胜利的信心。

解放后，出狱的同志与记者看到在四号牢房的墙壁上涂满了点点片片的血迹，在血迹旁的一块比较干净的墙面上，用黑粉末写着世界语的诗词，这是许寿真同志的遗笔。他在狱中和平时一样，用世界语这个武器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并用它进行自我教育和教育同志们。他教难友们学习世界语，唱世界语歌，用世界语宣传共产主义，传播各种消息，揭露敌人。他教的世界语诗词很多，其中一首译词是：“为什么全球不能成一家？为什么人类纠纷乱如麻？为什么同是大地的儿女，却说着彼此听不懂的话？在这红星的旗帜下，沟通被压迫者的呼声。在这红星的旗帜下，团结起全世界受难的人群。在这红星的旗帜下进行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他编了很多世界语的教材，其中有一段教材写道：“毛泽东

是谁？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的伟大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爱他！狗们恨他！蒋介石是谁？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美国人的走狗……。”他还教大家唱国际歌、马赛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以鼓舞难友们坚持斗争。五号牢房的同志爱唱国际歌，但唱不全、唱不准，许寿真同志将《国际歌》整个曲谱和歌词写了一份，秘密地传递过去，同志们如获至宝，练了两三天就会唱了。到了傍晚，他们唱得更加起劲。

许多同志身在狱中，却十分注意学习。他们就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的光线，偷偷地、用功地读着很不容易得到的书报，如经济学、中国通史、多桑蒙古史、中国近代史、工商导报、新新新闻、文学书籍等，这些书籍都是同志们的家属多方转托关系，非常艰难地送进去的。报纸多是通过向伪宪兵做工作，或借或高价买来的。七号牢房的难友没有报看，他们在墙壁上打了一个洞，从洞眼里看狱卒李老头屋里的报纸。许寿真烈士的遗体发掘出来时，他的衣袋里还装着鲁迅的《彷徨》，书上染满了血迹。

关在第二牢房的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黄子万几位同志（都是中共党员）看报后，经常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互相鼓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他们还把他们的分析告诉其它牢房的难友，互相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在狱中，只要有同志搞到报纸和重要消息，几个钟头内，就能传遍整个监狱。

在狱中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革命同志想尽办法互相关怀，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坚持战斗。他们用敲打牢房之间的墙壁作联络信号，接通后，一边嘴靠墙讲，一边耳贴墙听，这样交流情况，鼓舞斗志，四号牢房的门窗斜对三号牢房的门窗，相距一米多一点，两个牢房的同志就充

分利用这有利的地形，经常躲过特务、宪兵的监视，抓紧时间对话。“放风”是同志们通讯联络最活跃的时候，尽管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十几分钟，要忙着倒便桶，解便，洗衣，做操锻炼等，但也不放过一切机会互通消息。匪徒爪牙虽严密监视，但仍切不断同志们的通讯联系。放风出来的同志路过其它牢房的铁窗时，牢房内外的联系就通了。每路过一次，牢房里（或外）的同志就低声讲话，这样来回几趟，就讲（听）完了一段话。这些简短的话语，有互相鼓励，有互通口供，有相约以“不”字对付敌人逼供，有互传时事新闻等等。一次，杨老通过李远山的牢房，趁匪徒瞬间不留意，就快速地低声说：“国民党和谈无诚意，但又打不赢，肯定会全部瓦解，不要急，我们再坐几个月，就会胜利出去。”杨老的这个分析，传到一些难友的耳里，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鼓舞。有的牢房不当道，有的牢房外有较宽的走廊不易靠近，这就只有用手势和面部表情来表达各自的内心语言了。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听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狱中的同志们欢欣鼓舞，非常兴奋，他们虽然不能尽情地高歌，但是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表示内心的喜悦，他们在小声细语、轻唱欢舞中热烈地庆祝了这个用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艰苦的斗争换来的光辉日子。五号牢房的同志还出高价找狱卒买到了酒，高兴地举杯庆贺。

有时候，监狱里也会关进可疑的人或者是伪装革命的特务。遇到这种情况，牢房里的同志就默默地观察研究。一次，五号牢房关进一个特务曾××，他想在牢房里找材料以邀功，但是五号牢房的同志警惕性很高，使他一无所获，几天后就出去了。一号牢房关进一个叫廖斌国的人，他进来以后就宣

扬说：“这里审讯不了我，还差得远。”又作了一首不通的污秽的诗，看到狱中的女同志就喊“密斯”。一号牢房的同志都厌恶他，怀疑他。“放风”时，杨伯恺同志得知他的情况后说：“狗屁！不是自己人。”这个装疯的人关了一个多月后出去了。

三、沉着英勇斗敌顽

在黑暗的牢房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进行的。

上午八点多钟，管狱员谢鲁的魔影出现了，他那极其反动、污秽的咒骂声，骤然冲破了狱中的沉寂，他每天都要在监狱的院坝里“讲授”一堂反动的政治骂人课。他血口喷人地恶毒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毒辣地辱骂狱中的革命同志，他那荒诞无稽、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使同志们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急切地想冲出去据理驳斥，杀其气焰。但是考虑到对敌斗争的策略，不得不以极大的努力压抑着满腔的愤恨，采取了无声抵抗的办法，同时激励自己与敌人斗争到底。谢鲁二、三十分钟的咒骂诽谤，除了自我丑恶表演外，什么也没捞着，他自以为“胜利”了，贼头贼脑地钻入了他的狗窝（管狱员办公室）。

一天“放风”时间，宪兵卓泽义借故用又粗又重的木棍毒打一个姓饶的难友，激起同志们的极大愤怒，许多人抓住牢房铁窗的栅栏拚命地摇着，抗议着。愤怒的吼声震动了全狱。从三号牢房的铁窗里伸出一只紧握拳头的手，那是杨伯恺同志在强烈抗议匪徒的兽行。“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们有打人的权力？不准打！放下你们的棍子！”他声色俱厉地大声吼着，那个反动家伙怒目环视，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木

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三号牢房“放风”时，杨伯恺同志与王干青同志秘密交谈，宪兵不断进行干涉，杨伯恺同志却置之不理。宪兵大骂杨伯恺同志“不听招呼，不知趣。”杨伯恺同志怒斥宪兵“多事”！宪兵动手打起来，杨伯恺同志奋起还击，这时同牢房的师家镛、张戟、王觉群等同志拚命地同宪兵搏斗，以护卫杨老。宪兵打不着杨老，气急败坏地端起枪威胁，大喊：“把你们统统枪毙了！你们造反啦！”狱友在铁窗口齐声怒吼：“敢！敢！……”怒吼声震惊了狱门外的其它宪兵，他们进来，目睹当时相持局面，怕惹出大事，不利于他们，只好收枪换岗而去，不了了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许寿真同志目睹管狱员谢鲁欺压同狱难友，便挺身而出，痛斥狗特务。特务骂他：

“你们是不是联合‘洋机器’（骂人的词语）。”许说：“联合就联合。”特务：“你联合是否打倒我？”许说：“不但要打倒你一个坏蛋，连蒋介石都要打倒！”特务叫喊起来：

“你敢反对！”许厉声说：“枪口对准我的脑袋，还是要反对！”特务气急败坏地喊道：“把门打开，把他拖出来，我要揍他。”许便自动把大衣脱下，昂首走出牢门，站在院子里。这时特务走进他的办公室，喊道：“你进来！”许说：

“不进来！”特务见许的口气很硬，便软下来，命令说：“你以后不要管我的事，今天我就饶了你。”许毅然地说：“没有条件可讲，对的事我就不管，不对的事我就要管！”特务象疯狗似的狂叫：“不准你吃饭！”许驳斥说：“为什么不准我吃饭？你没有权力不准我吃饭！哼，你是什么东西？”

特务暴跳起来，大喊：“我要用手铐把你铐起来！”许轻蔑

地从容回答：“哼，铐起来！没关系！我今天被铐起来是为了正义，为了真理，是光荣的。等明天把你铐起来的时候，才是卑鄙、可耻的。”这时特务呆若木鸡，气急地问道：“明天？明天是什么时候？”许笑了：“哈哈，总有那么一个明天！”特务老羞成怒，气呼呼地说：“我今天把你铐起来！”许说：“现在你铐起，我还可以说话，我还可以尽情地唱！”这时谢鲁喊来几个爪牙，把许拖到牢房铁窗下紧贴着窗口地方，强迫他、站在牢房里，把双手伸出窗外，然后用手铐铐起来。然而，英勇的许寿真同志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发出爽朗的笑声，说：“我可以自由地说话了！”于是他使用世界语唱起国际歌、马赛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吧，祖国英勇的孩子们！斗争的时候到了……”他的歌声格外宏亮有力，激动着狱中同志们的心。同时，他向狱中同志们讲道：“……我们今天还是要斗争，直到我们看到光明。我们并不是为个人，我们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接着他又唱起了国际歌、马赛曲。

这时候，无耻的特务又制止说：“清你不要唱。”许寿真同志带铐动不得，还是用手指着骂他：“哈哈，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压迫我们，你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你这样的东西？你都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你这个废物，你们做尽了人间坏事，你们这些人都是坏蛋！国民党用你们这些坏蛋，把中国人民整惨了！”全监狱沸腾了，一致声援许寿真，坚决要求特务立刻取下许的手铐，否则全体一致绝食。全狱同志的斗争，终于迫使敌人打开了许寿真同志的手铐。这位英勇不屈的战士胜利了，革命的同志们胜利了，同志们高兴地对着他微笑。

四、把牢底坐穿

浩气凛然，铁骨峥嵘。在狱中，任凭敌人诱惑欺骗，酷刑拷打，革命志士们不动摇，不妥协，坚贞不屈，英勇地与敌人斗争到底，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刻。

“宁愿把牢底坐穿，流尽最后一滴血，绝不吐露丝毫线索，决不签署什么‘反共宣言’。”这是狱中革命同志的誓言。川大学生余天觉、方智炯、田中美、李维品、杨政声、冷观樵等六人被 U·S·A 的手铐铐着，一齐被捕入狱。他们六人一条心，相约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坚决不写反共宣言，不供出任何一个进步同学。这誓言，他们一直坚持到余、方、田三位烈士死难，其余三人被保释。田中美烈士经常说：“前进，前进，穿过坟墓前进！”他最后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方智炯同志为表示坐穿牢底的决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方坐穿”。他入狱的第二天，敌法官审讯他，威胁说：“你们川大学生什么‘尊师会’呀、‘萤火会’呀，把成都闹得天翻地复。共产党喜欢你们，可是你们落在我们手里了，老实交出组织，否则今天非把你枪毙不可！”方智炯处之泰然，并反驳道：“我是学法律的，你要枪毙我，应当有事实根据，”特务法官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讲法律。”方智炯昂首挺胸地说：“我没有组织可交，要枪毙，请动手！”敌人无奈，狠狠地打了他几耳光，又把他投入牢房。杨老慰勉方智炯说：“二天我们打回来！”杨政声同志被捕前任川大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在“四九”血案周年纪念晚会上，他登台朗读过《祭国民党戡乱委员会》一文，他早已作好了坐牢的思想准备，被捕后的第一天，他便在牢房的墙壁上题诗，以示自己坐穿牢底的决

心：“这不是生命的丧钟，这是新生的开始，假如人生象一条河流，监狱生活就是河底的磐石，没有它，生命便不能湍激奔腾”。余天觉是一个极活泼的青年，唱歌、扭秧歌、跳午、唱京戏样样会。他在狱中除当总务主任管同志们的生活外，唱歌就是他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他在敌人的威胁面前，他曾组织领导牢室同志们的“四部合唱”，向匪徒示威。他时刻作好了思想准备，与敌人斗争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一个炎热日子，五牢房的刘骏达同志（中共党员，中学教师），被特务喊出来站在院坝里。整整的在烈日下站了一天，特务不准他喝水、吃饭，刘骏达同志汗流尽了，口干舌焦，饥肠辘辘，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敌人的折磨。狱中同志都关心、注视着他的情况，考虑着怎样声援他。他一直吃力地、坚定地站着，怒视着监视他的匪徒。敌人企图逼他变节，在他身上得到线索。因为敌人认为他二十年前就是共产党了，是西北联大的“危险分子”，又是当时中学教师反饥饿运动的组织者，所以用这种“疲劳轰炸”折磨的办法逼他就范。但是，敌人失败了。刘骏达同志经受住了痛苦的折磨，什么也没说，傍晚时，敌人只得又把他关入牢房。被保释出来的《新民报》记者赵纯继同志的一篇文章里写着：“……骏达同志非常坚决……”。

一九四九年九月关进牢房的张大成同志（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曾在一天内连续受几次酷刑，两手和两足的大姆指都被折断了，但他并不牵出任何一个同志和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正因为如此，中共川西边临工委领导下的川康边人民游击区队崇灌支队的发展未受影响。

成都华西大学学生毛英才（女，民盟成员）被捕入狱以

后，敌人对她两次用刑，想从她口里得到线索，逮捕更多的进步青年，但都枉费心机。敌人又用断绝一切接济的办法威胁她，尽管她的衣服大都破烂了，皮鞋被老鼠咬得满是缺口，但她毫不在乎，仍然坚持斗争。毛英才还时常朗诵苏东坡的《留侯论》借以励己励人，关在她隔壁的朱冤群同志说，每听她读“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夫天下之大勇者……”使我焦急的心情，为之一爽。后来，敌人又把她六十四岁的老父亲找来，劝她“悔过自新”，换取释放，企图以骨肉之情打动她。她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当着她父亲的面怒斥敌特罪行，并说：你们（指敌特）的日子不长了，我们很快就要胜利！”坚决地抗拒了敌人的诱降，使得在场的敌特审讯组长杜石公也感到惊讶。她的老父亲对敌人说：“我不能逼坏自己的女儿！”敌人的诱降阴谋彻底失败了。

许寿贞同志在法庭上，当特务法官问他：“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同时要他交出组织关系。许严厉地说：你不要问我党历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象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可怕，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法官继续问他：“象你这样的人，成都有多少？”他说：“请你们不要连累无辜，大肆捕人，他们有的是我的世界语学生。”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没有动摇妥协过，严词拒绝了签署“反党宣言”。他以承认一切都是他个人做的，保护了同志，实践了自己生前讲过的“要经得起流血牺牲的考验”的庄严誓言。

受狱友尊敬的不肯觅保的老英雄杨伯恺，为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已不是第一次坐牢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他被关进监狱以后，党组织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以

后敌人答应杨老取保释放。当特务通知他时，他质问敌人：

“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无罪！爱国无罪，爱国有理！要我们出去，拿一个严正的手续来！”笔者在狱中时，一个有些正义感的宪兵告诉我：“关在上面三号的那个老头杨伯恺，喊他取保，他不取，他说，你们怎样把我抓进来，就怎样把我送出去！他对审讯是从不‘拉稀’（指妥协）的。”杨老自己拒绝取保，可是，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主张狱友在不损害同志，不损害组织的原则下，争取取保获释。他自己呢？他认为狱中还需要继续斗争，斗争需要他，他不能离开这个战场。杨老的这种忘我牺牲的精神，在狱中流传着，它教育、鼓舞着同志们斗争到底。

特务对杨老要尽了威逼利诱的诡计，都不能丝毫动摇他坚贞的革命意志。特务又异想天开地想通过杨老的学生关系搞劝降。杨老对“学生”的无耻勾当，勃然大怒，拍桌怒斥，一下掀翻了特务面前的大桌子。特务对他无可奈何。杨老被狱中同志称誉为永不妥协的老战士。

狱中“三老”之一（王干青、于渊、杨伯恺）的于老（民盟中央委员）与杨老关押在一间牢房里。他与杨老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持对敌斗争。他作为杨森的代旅长，在阵地上为红军让路，受过国民党军法处分，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解放，长期搞民主进步活动。在狱中，他经常关心年轻的同志，帮助他们。有一次特务法官审讯他，他听了匪徒的胡言乱语，愤怒地用茶碗打了法官的头。法官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叫嚣一阵后，又把他押回牢房，命令严密监视。

时光在流逝，狱中革命的斗争不断地进行着！